

科学发展的 哲学思考

张文彪 黄平 潘叔明 著

科学发展观的 哲学思考

张文彪 黄平 潘叔明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考/张文彪, 黄平, 潘叔明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1

ISBN 7-211-05262-7

I. 科... II. ①张... ②黄... ③潘... III. 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IV. 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9379 号

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考

KEXUE FAZHANGUAN DE ZHIXUE SIKAO

张文彪 黄平 潘叔明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编: 350003)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9.25 印张 219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1-05262-7

定价: 15.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装帧设计：薛志华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五十年来发展思想演进	(1)
第一节 马克思晚年探索与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	(2)
第二节 中国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思想.....	(21)
第三节 科学发展观的酝酿和形成.....	(48)
第二章 科学发展观的政治维度	(68)
第一节 以人为本：执政兴国的新理念.....	(69)
第二节 公民：自主的政治主体.....	(81)
第三节 和谐：政治文明建设的执政宣言.....	(91)
第四节 和平崛起：实践、观念与精神.....	(101)
第三章 科学发展观的经济维度	(115)
第一节 发展与科学的发展.....	(115)
第二节 发展的经济本体论.....	(126)
第三节 绿色发展：人类与自然的新经济关系.....	(137)
第四章 科学发展观的伦理维度	(152)
第一节 类的发展与个体的发展.....	(152)
第二节 执政党的政治伦理.....	(167)
第三节 人与自然的伦理对话.....	(182)

第五章 科学发展观的社会维度	(199)
第一节 社会公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永恒话题.....	(199)
第二节 社会政策：中国如何走向社会政策时代？.....	(214)
第三节 社会和谐：公民意识与人权保障.....	(229)
第六章 科学发展观的人文维度	(245)
第一节 以文化成：民族精神的时代性.....	(245)
第二节 科学理性：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反思.....	(260)
第三节 形上诉求：人类生存与行为方式的价值判断 ...	(274)
后 记	(290)

第一章 中国五十五年来发展思想演进

中国在清代末期就已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国建立，虽然结束了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但是并没有改变这种性质的社会。近代世界历史进程向中国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然而，中国现代化首先中断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中国共产党首先要改变这种性质的社会，领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发展中国的现代政治、现代经济和现代思想文化，自然被提上历史进程。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有选择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政治和思想方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了这些方案，论述了这些方案的失败及其原因。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中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否可能，需要实践证明，也需要理论的确切回答。这个任务并没有最终完成，因为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没有成功，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仍在进行中。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不断地对此进行必要的探索，做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回应。因为这是中国近代发展思想演进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历史选择。

中国现代发展思想演进中重大历史选择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专家们有力地论列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12次的重要谈话，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思想演进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创新的过程。其理论任务是：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不同所有制联系起来，判明市场经济不属于制度性范畴；从计划与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体制

和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多层次分离开始，判明体制作为一种具体制度，它是基本制度实现形式，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种实现形式；从着眼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上论析了社会主义本质以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应当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为此判明在制度性范畴和非制度性范畴结合上应采取高度灵活性。

中国发展思想的最近演进是科学发展观的酝酿和形成。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理论界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时就提出了“生产目的”问题。80 年代初重提这个问题，劳动者个人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和体力脑力发展受到关注，国家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也从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改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强调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2004 年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国家领导人终于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第一节 马克思晚年探索与中国 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马克思在 1879 年至 1882 年间留下一批数量很大的鲜为人知的笔记。这批笔记已被整理发表的有《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拉·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约·巴·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前 4 个笔记已收入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这些笔记的发表和传播，已引起国际学者的关注，并得出这

样深刻的印象：马克思晚年在从事一项重大的理论探索。1986年12月在福州召开的全国首届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主要从笔记的写作动机方面衍发马克思的晚年的探索。他们分别认为：是为了实现对人类学本体论的进一步论证，或对早期哲学人本学的复归与确证；是在于超越《资本论》的革命模式，探索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即俄国革命道路；为创立东方社会理论做准备而着手研究史前社会的理论；为探索世界历史发展的新局面而构思描画一个规模宏伟的未来理论巨著的轮廓。这里将不直接讨论这些动机，而着重考察马克思提出不断革命论以后特别是马克思退出公开的政治活动舞台之后所面临的一些迫切的理论问题。

这些迫切的理论问题，与中国发展道路都有密切的关系。

不断革命论演变、反思及其中国的选择

马克思不断革命思想的形成同他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是平行的。他的不断革命论的形成和发展在其生前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研究资产阶级不断革命的历史经验阶段。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比较了君主制度和雅各宾专政制度，认为雅各宾专政时期历史独创精神的特征是不不断革命；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则区别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指出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局限，认为只有通过不停顿的革命，才能使政治生活成为人的真实的、没有矛盾的类生活，完全实现人类自我解放。马克思首用不断革命来描述资产阶级革命上升时期所表现出的彻底性，即不容保存“法制基础”。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激荡年代，从1789年到1793年，三次巴黎起义，立宪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一个紧接一个地推开前面不能继续前进的同盟者并送其上断头台，革命从君主立宪到推翻国王、宣布

共和、进入革命民主专政。政权不断易手，革命不断深入。即使在经过 1794 年热月政变和 1799 年雾月政变以后，拿破仑执政虽在国内使资产阶级在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的环境里转向反革命的统治形式，用“不断的战争代替不断的革命”，但在欧洲，拿破仑战马送去了拿破仑法典，欧洲反抗了他的战马的蹂躏却接受了他的法典。历史上，拿破仑大陆体系的政治结构早已瓦解，而他的法典却被沿奉下来，成为现代西方国家的大陆法系。战争带来废墟，但也带来各种狂飚突进的民主主义政治俱乐部、自然法、理性哲学、浪漫主义思潮，以及从卢梭的人权思想到费希特—傅立叶的劳动权思想的演进。表明历史进程在充满变迁中急剧发展。正是这种不断革命所表现的彻底性，给欧洲大陆的进步力量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涌现了许多不断革命的拥护者。可以说，这个历史榜样是马克思不断革命论的历史来源。

二是用无产阶级不断革命代替资产阶级不断革命的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新莱茵报》的那些政论文章中，比较了资产阶级革命在 18 世纪“沿着上升路线”发展和在 19 世纪中叶“沿着下降路线行进”的重大变化；同时不断革命反映社会革命中阶级矛盾冲突按层次逐一展开和不断激化，像地主贵族、金融贵族、自由资产阶级、激进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各种冲突都以极其鲜明的党派斗争表现出来。因此马克思设想通过不断革命造成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彻底摆脱过去革命中未能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逐个地把资产阶级派别从政权高峰上一一推下去，直到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因此，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纲领，指出共产党人到处支持那些反对政府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的革命运动，但是应该把资产阶级革命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接着，《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及同期的其他著作，陆

续地提出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工农联盟问题及人民武装、民族解放和国家形式等重大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道路，就是用无产阶级不断革命完成资产阶级放弃的未尽的革命任务，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告同盟书》中，以区别空想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纲领和无产阶级纲领之间的对立，对这个理论作了概括：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民主派小资者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①

无疑，这个理论的历史对应是欧洲的革命，特别是对 1848 年革命的一种总结。但是，从 1872 年开始，欧洲的革命沉寂了，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农民以废除封建残余为满足，开始转向现存秩序方面。工人运动为未来战斗进入“和平”准备阶段。不断革命实际上已从单纯的政治革命走向更为广泛的社会运动。

三是不断革命的反思阶段。

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策略由于过高估计当时无产阶级革命主客观条件而没有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纠正自己的错误，认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462、368 页，人民出版社，1995。

1848年的判断是半先验的，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此外，在许多国家里，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但又坚持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革命的策略原则，只是反对不顾历史条件无限制地运用这个策略思想。所以对不断革命的反思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科学的反思。为了揭示不断革命的客观性，马克思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把革命形势的到来同经济危机直接联系在一起。几乎每年都有对危机的预言和论述大量披露在信札和文章里。阿姆斯特丹社会史国际研究所保存的马克思关于1857年至1858年的《危机笔记》和1866年危机摘录笔记，至今仍吸引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史专家们的注意。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形成了危机理论，并越来越把危机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他们甚至为了能够把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特殊现象“消费”到他的理论“生产”上，决定推迟《资本论》第二卷的出版工作，从而在决定是否利用危机号召革命的问题上持极其谨慎的态度。另一是价值的反思。马克思始终没有放弃对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后果的批判，始终没有放弃“改变世界”和“人类解放”的价值。他追求使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跟自己分开的那种人的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又极其现实地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任何革命纲领中，为劳动者的解放而争取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①并第一次明确地把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这样一来，不断革命被理解为以多种灵活方式实现革命发展中各个阶段的固有任务，它不直接等同于民主革命、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5页，人民出版社，1995。

会主义革命或世界革命，它也不是以某种固有的方式（如大规模的、持久的、剧烈的社会冲突，社会阶级斗争）的连贯性把几个革命都串在一起。它必须根据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况和社会条件来决定革命的任务和形式，而不是去制定绝对的统一的不断革命模式。不过，应当说马克思的上述反思仍然基于对欧洲革命的考虑。直到他的晚年——我们现在才开始从他留下的笔记中发现——他有了更新的探索。他开始注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落后地区、外围地区及其殖民地的革命形势的发展。而研究这些地区、国家的古老社会经济形态的瓦解的各个阶段的特点和前景；研究它们的传统的社会文化关系的演变和趋向；研究基于这种社会机制而发展起来的各种阶级对抗的状况，以及它们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特别是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研究与探索都成为该时代的迫切的理论问题。显然，马克思未及完成这一理论任务，但他留下了重要的思想。他指出根据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概括出的“资本主义必然性”仅限于欧洲；他不同意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①

马克思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人类历史进入近代世界以来，历史已是世界的历史。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实际上由近代世界历史进程提出来。中国从无阶级社会到有阶级社会的转变的历史很长，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的历史也很长。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开始提出改造中国的各种政治主张，其中主要有立宪的资本主义主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发表的马克思于1877年11月和1881年分别给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和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人民出版社，2001。

张，民主革命的资本主义主张，社会主义主张。中共二大通过的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它的指导思想就是“不断革命论”。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同样遇到了不断革命的问题。但是他认为，中国不是直接从封建主义进入一般的民主主义，中国当时的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所以中国革命要有两次转变，实现这种转变的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统一的革命理论。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次转变，是从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如中国的辛亥革命）向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

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从革命阵线上说，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是被无产阶级所领导，而不是被资产阶级所领导；是以建立各个革命阶级（在中国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所以为帝国主义所不容，必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而不是融入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阵线，不反帝和不彻底地反封建。

毛泽东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国情，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道路，论证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建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新民主主义论》。

应该看到，中国民主革命不是从马克思民主革命的理论中逻

辑推衍出来的，但又完全与马克思晚年探索成果取得一致，即东方革命道路不可能同西方一样，因为东方社会历史过程有其特殊性，世界历史不可能以欧洲为中心线性地展开。即使到后来，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也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中逻辑地推衍出来，但同样地又完全与马克思晚年探索成果相一致，依据中国国情，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当然，这与马克思晚年对东方革命道路探索有密切的联系。

东方革命道路与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

马克思晚年对东方革命道路的探索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十分复杂，这里只择取三个问题进行考察。

一是东方社会的历史过程理论问题。

马克思晚年从路·亨·摩尔根的著作中发现了氏族公社的结构，导致历史分期划出一个完整的史前社会阶段。弄清了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础，纠正了原先把个体家庭看作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社会的基础以及整个社会结构都是个体家庭的扩大的错误观点，从而也纠正了因个体家庭的内部对抗包含了后来一系列的奴役和剥削而推论出“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历史”的错误论断。马克思看到这种氏族结构在各民族的历史上都是普遍存在的，但是由于各个民族的氏族的瓦解的道路不同，因而呈现出以氏族社会续谱为背景的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历史多线发展，即表现为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及其不同的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

在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中，他确认如下的历史事实。其一，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社会的建立，是以奴隶制代替氏族公社制度的。其特点是：原在父系氏族中，实行家庭私有制，使个体家庭成为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使奴隶劳动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其二，德意志人国家不是通过自己的奴隶制发展道路形成

的。日耳曼社会内部开始萌芽的奴隶制，并没有在被其破坏的罗马奴隶制废墟上继续发展并代替它，而是承受罗马社会内部已经产生发展起来的封建因素，并和自己内部因氏族解体所发生新因素交互作用，产生出一种新的综合制度，直接建立了封建制国家。所以承接日耳曼人氏族社会的不是奴隶制国家，而是封建制国家。它所实行的是农村中有马尔克、城市中有行会的大土地占有制的农奴制。其三，亚细亚的或东方的农村公社把原始共同体的土地公有制度保留在阶级社会里，一直延续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如果说前两个历史事实主要是通过摩尔根等人著作加以肯定，那么对于这第三个历史事实则花了很大精力从梅思、菲尔和柯瓦列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中来研究这种社会形态的特殊性。马克思不同意菲尔把东方公社和社会的关系规定为封建主义，批评“菲尔这头驴，把乡村制度称作是封建的”，同时还反对柯瓦列夫斯基所力图证明的东方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瓦解同西欧一样也有一个“封建化”的过程，因而在笔记中删去具有这种一般性结论的柯著导言。他指出在印度不存在农奴制，也不存在贵族性的土地制度，土地可以出让给平民；在大莫卧儿帝国，特别是在民法方面没有世袭司法权。同时，根据印度的法律，统治者的权力不得在诸子中分配；这样一来，欧洲封建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便被堵塞了。马克思主张把东方农村公社同西欧封建社会区别开来。他认为这样的农村公社存在着前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已有国家存在，但既不是奴隶制国家，也不是封建制国家，而是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的东方君主专制制度。^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284、274、323页，人民出版社，1985。

在马克思所确认的三个历史事实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作为原生形态的氏族公社在一切民族和地区中都有其共同特征，即实行公有制和民主制。但在不同的地区和民族中，它存在的时间不同，构成的类型也不同。罗马、希腊公社个人财产表现为以公社为媒介，每一个单个人又是私有者。日耳曼公社所有制仅仅表现为个人所有制的补充。东方公社的单个人的财产并不是同公社分开的个人财产，而个人只不过是公社财产的占有者。因而当原生形态的氏族公社转向次生形态时，转变的历史道路是各不相同的。希腊、罗马直接向奴隶制国家发展，转变为古代奴隶制的奴役形式；日耳曼人直接向封建制国家发展，转变为中世纪的农奴制的奴役形式；东方社会向君主专制的高度集权国家发展，并有许多地区在近代直接沦为雇佣劳动的奴役形式。马克思的研究表明，他虽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列举可以看作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几种生产方式，但是并非各民族都依次循序逐一经历每一大类型的生产方式的递演，而是各以其特殊的历史道路典型地经历其中某个或某几个大类型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就单个的民族或国家而言可能会发生许多历史的“例外”。对于东方社会来说，尤其显得如此。可以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历史过程的研究，主要在于探索东方社会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发展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可能性的探索，也开始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之后，虽然其性质仍是资产阶级的，但不能停留于此，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横插一个资本主义，必须紧接着实现第二次转变，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毛泽东在论证新民主主义经济时已确认了中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他指